

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理念 推动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实现新跨越

赵永军



2023年度金上京皇城西南部建筑遗址发掘区全景航拍(上下东西)



2023年度大庆九间遗址发掘区航拍

作为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鼓足奋力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干劲，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自觉贯彻落实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考古力量。

2023年12月19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加强规划引领。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要义，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大目标，结合工作实际，加强系统谋划和科学布局，充分发挥考古工作的深厚作用，真正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精神转化为推进现代化黑龙江建设的考古行动。

黑龙江流域人类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文物遗存被不断发现、认知。这些文物遗存包含了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各类遗存，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东北远古文明的起源、疆域形成、民族融合与迁徙和近代化进程，也证明了自史前时期黑龙江流域人群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就不断地与周边地区交流、融合，共同构建起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黑龙江的考古学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深化研究阐释。结合黑龙江省考古研究特色，聚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课题，精准把握黑龙江考古工作的研究要点，实施好金上京遗址、九间遗址、小南山遗址、洪河遗址等重要遗址考古发掘与资料整理项目，着力开展黑龙江流域史前文明起源发展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研究等学术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多项课题考古，考古项目涉及遗存时间跨度长，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唐渤海国时期、辽金时期，直至30世纪上半叶的重要遗存。“十四五”期间，继续对一些重要遗存持续开展考古发掘研究。小南山遗址是目前乌苏里江流域发现的最重要的多时期古代遗址，2015~2021年开展连续考古发掘，取得了黑龙江流域考古研究历史性的新突破。发现近200件距今最早的玉器，将玉器的发现提前到距今9000年左右。洪河遗址文化层堆积深厚，是黑龙江流域目前发现堆积最厚、保存最好的遗址。通过2013~2021年连续发掘，明确了洪河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与昂昂溪文化属于同一类遗存，是昂昂溪文化的中心聚落，对于中国史前考古的聚落研究具有特定的意义，为“考古中国”研究提供了难得的黑龙江流域案例。金上京遗址是金王朝修筑的第一座都城，是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通过2013~2022年开展连续性的考古工作，拓展了对金上京城址形制结构特征和历史沿革的认识。为全面深化认识金上京皇城布局与沿革增添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九间遗址总面积约20余万平方米，通过2019~2023年连续发掘，加深了对黑龙江省西部地

区辽金遗址的文化面貌的认识，丰富了辽金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类型，特别是为研究该地区辽金时期大规模聚落遗存的能与性质以及手工业的状况提供了新材料。

三是树立全局思维。配合省内重大工程建设，科学高效实施好基建考古项目，全力抢救保护各类文物遗存。近一个阶段以来，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仍然是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近五年，省考古所共开展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勘探数十项，考古发掘20余项。对基建工程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不仅保证了国家基本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抢救和保护了大量的文物遗存，为深入发掘黑龙江省历史文化内涵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 and 依据。

新时代新征程，黑龙江考古工作者将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总目标，科学统筹大遗址保护和考古工作，树立“大考古”工作思路，加快推动考古成果阐释和转化，努力讲好中国故事黑龙江篇章。

加强边疆考古研究，探索地域文明。黑龙江考古属于中国边疆考古和东北亚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考古立足本省，面向和放眼于东北亚地区，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开展为引领，做好未来一段时期考古工作规划。持续深入推进石器时代考古、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渤海考古、辽金考古专题研究，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深入探索黑龙江地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以及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物价值阐释传播。加快考古资料整理，推出一批考古研究成果，进一步挖掘文物资源背后的深厚内涵。进一步探索向社会和公众传播普及考古学的基本知识、普及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有效途径，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不断转化学术成果与社会大众共享，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为促进遗址有效保护、传承发展、探索文旅融合提供考古学支撑。

加强保障，夯实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当前省内考古工作条件相对薄弱和不充分的情况，锚定重点科研发展方向，建设能够满足黑龙江省当前科研需求及可持续发展的水平高的考古科研基地。积极推进黑龙江考古标本库房建设，打造集考古标本存储、保护、研究、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黑龙江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基地。进一步提升考古科研装备水平，补充和增添先进考古装备，配齐配全相应的工作设备设施，优先满足考古业务工作开展，不断提升工作能力。

加快构建一支科学合理稳定的人才队伍。以人为本，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进一步优化环境，注入激励机制，持续加强队伍的科学管理和自身建设，引进优秀人才，培养年轻人才，用好现有人才，努力在“十四五”期间，紧抓机遇，逐步完成解决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机构编制短缺和专业人才配备不足的问题，建设一支与文物资源、工作任务与职责相匹配的研究机构和专业队伍。

(作者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王若飞革命活动旧址： 革命文物保护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李静



旧址修缮前后

革命文物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融入城市更新，加强了革命文物保护的同时，也为城市发展赋能。近年王若飞纪念馆积极落实党中央相关文物工作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包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旨，积极开展保护利用工作，同时借力进行周边红色街区打造，将红色文化与市民生活相结合，将红色精神融入公共服务设施，传承红色基因，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王若飞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处近现代革命史迹，体现了党对民族地区革命工作的关心帮助与指导，在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纪念王若飞同志1931年在内蒙古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光辉业绩，1962年在泰安客栈旧址成立王若飞革命活动旧址展览展示管理机构，即王若飞纪念馆。1964年该纪念馆被公布为内蒙古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若飞革命活动旧址保护利用及红色历史街区打造实现了文物保护与历史街区嵌入互生，实现了革命文物与红色旅游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城市升级和老城保护的协同发展。

统筹规划，本体保护与风貌保护并重。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2022年至2023年对旧址文物建筑本体进行保护性修缮工程，同时完成旧址消防工程建设和内部配套设施的整改工程，有效保护了旧址文物建筑本体，并为充分发挥王若飞纪念馆红色教育职能夯实基础，提升完善纪念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2023年8月，全面盘活利用王若飞纪念馆及周边资源，用“微更新”代替大拆大建，将民国建筑风格和党建“中国红”建筑内核进行有机融合，对街区立面进行整体整治，对街区店铺进行特色化处理，形成历史风貌鲜明和独具特色的红色街区，焕新亮相的包头红街带来的华丽蝶变，实现了真正的城市有机更新和城市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提档升级，丰富展览展示利用。为进一步丰富展览展示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包头市政府投入100万元经费用于旧址内部展陈提升，实施泰安客栈旧址

复原项目，推出“红色历程——包头泰安客栈革命历史陈列”。同时组织策划实施完成2023年中国文化馆年会中分会场红色文化展示活动。另外对接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引进中共七大专题展，以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第二批主题教育。

目前王若飞纪念馆展陈共四项，充分尊重历史、保护文物，最大限度地利用展陈空间，在深入研究和整理挖掘革命史料、征集革命文物上下功夫，在展陈内容和陈列方式上努力实现图文并茂、情景交融，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

协调配合，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为充分保护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优化场馆周边的街区环境，营造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以更好地满足市民游客日益增长的文旅消费需求，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包头市、东河区两级多部门统筹协调，全力对王若飞纪念馆及周边进行环境治理，积极配合属地政府，重磅推出极具老包头特色的历史文化商业街区——包头红街。在保存好核心区历史风貌的基础上，使单体建筑特点、文物整体风貌与周边经济业态有机融合、协调发展，努力让文物“活起来”，把人气“聚起来”，再现老包头的往日繁华。

按照“文物保护是核心，环境整治是前提，有机更新是遵循，民生改善是重点，生态提升是关键”的工作理念，具体治理改造场馆周边地下管线铺设整改，实施建筑、巷道、底部门脸的统一，重点打造文创集市区、智慧街区全息宇宙主题区、王若飞情景剧体验区、影视直播打卡基地等几大街区主题核心元素，形成以“老包头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文旅故事线，将红色精神融入公共服务设施。

打破时限，提升知名度美誉度。改造后的街区实行开放式管理，游览线路顺畅，符合群众需求。场馆推出调整馆日、延时闭馆等服务措施。2023年8月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游客每天可进馆参观，并且延时闭馆，丰富了群众消费文化夜生活。2023年9月起推出错峰闭馆模式，让游客周一有纪念馆可游。中秋、国庆期间推出夜游红街，文艺演出润民心，拉近了老百姓与文物的距离，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强化宣传，发挥文物教育功能。王若飞纪念馆作为包头市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红色文化宣传，为人民群众推送丰富多彩的音频、视频、展陈，充分发挥教育基地功能。一是策划录制广播剧“永远的忠诚——王若飞革命事迹联播”和专题片“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王若飞”，通过各媒体大力宣传革命先烈的崇高品格。二是开展传统革命文化线上宣讲，先后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推出数期革命先烈光辉事迹宣讲，宣讲员声情并茂地讲述，结合历史照片、文献史料，带领观众朋友回顾革命先烈的光辉革命历程。三是深度挖掘革命文物的历史底蕴，结合地域特色、纪念活动、展览主题等方式，打造开发30多款展现红色文化与老包头文化相结合的创意产品，让游客把革命精神和景区记忆带回家。

王若飞纪念馆旧址保护利用及红街打造工程不仅解决了文物本体雨水渗漏、墙体酥碱、立柱糟朽等问题，也很好保护了街区历史风貌；对旧址进行旧貌复原陈列，解决了文物有效利用的问题，丰富了展陈；旧址北侧实行开放管理，将文物古建与历史街区有机融合，协调发展，方便居民游客；打造红色文化街区带动了红色旅游，盘活了周边经济业态。2023年8月历史街区改造以来，累计接待客流60万人次，高标准完成了既定任务，向游客及观众交出满意答卷。

文物保护利用活化是一个大工程，单靠文物部门一家还不够，要借助城市更新、生态保护等资金，开展活化利用工作。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地方各级政府、行业部门达成共识，形成合力，齐心协力，共同推动文物事业发展。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合理有效利用现有文物古建筑和老建筑，利用现有格局，做到保护与利用协调一致，相辅相成。

以王若飞革命活动旧址为核心的红色历史街区的打造探索出了一条为人民留住乡愁、守住情怀的文化街区和教育实践重要阵地的有效路径，让革命精神得传承，历史文物得保护，当地经济得发展，人民群众得实惠。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沂蒙精神

——《大众日报》的创刊与相关文物

秦博

沂水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老区的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铸就了光荣伟大的沂蒙精神，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沂蒙精神，作为文博工作者责无旁贷，履职尽责保护、利用好革命文物，让文物活起来，利用革命文物，讲好红色故事，以物述史，以史崇德，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大众日报》的诞生

抗日战争时期，舆论宣传可以更好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策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进一步扩大舆论宣传的影响力，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提高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1938年年底，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着手筹建报社。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亲自到费县联系国民党六十九军政治部部长张友渔和副部长匡亚明，还有刘导生。孙陶林和刘导生早在北京大学是同学，他们还曾一起参加过1935年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次相逢促使他们决定一起筹办报社。刘导生和匡亚明留在山东筹办报纸，由孙陶林牵头，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亲自到沂水当地的一家进步报纸——《青年报》，社里10个人带着办报的全部家当，包括一部收音机、一部油印机、两部电话和七条步枪。

《青年报》的其中一位创办者叫张冠西，后改名为李载。他为张氏“五大门”之后，沂水城五悦庄人。另一位创办者张荣，原名叫张文荣，主要工作是经营报纸。还有一位叫张惠，原名张富基，他和张冠西是平辈，参加革命后转战各地，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中山医院党委书记任上离休。

报纸创办人之一还有张兰亭(1911-1988)，他主要负责办报物资采购。其夫人是黄山铺东泉庄村人，他们的长子张照建解放后从《大众日报》社先调到山东人民出版社，后来又调到山东省图书馆，女儿招工到新华印刷厂工作，还有两个儿子在沂水老家务农。另一位创办者安凌云也叫安然，是龙家圈乡文家庄村人。当时的安凌云就在张氏五大门出资建立的学堂教书。他与张冠西志趣相投，所以一起创办《青年报》，后来他娶了张善人的孙女为妻，成为五大门的女婿。

刘导生和匡亚明接受任务后，白手起家办报纸，也幸好有沂水《青年报》的人员和设备机器的加入，山东分局给配备电台和专业的通讯人员，当时还从岸堤干校抽调了十几名青年干部充实报社，有刘一川、郭克刚、黄中华。经过刘导生和匡亚明请示，山东分局领导同意，把原本设在天马场的印刷所搬迁到距离王庄八里路外的云头峪村。王庄有座鸡宝山，海拔602米，顶端呈锥子状所以又称其为锥子崮或者云头崮，崮下峪中有一个小山村，就叫云头崮，崮有五六一里，三面环山，东西走向，是王庄的八大崮之一，地势隐蔽山路崎岖。经过紧张的准备，东拼西凑，报社就在艰苦的条件下，抗战的烽火中成立了。

刘导生任社长，匡亚明任总编辑，刘一川任印刷厂厂长，当时的编辑部共4个人，负责4个版面的编辑工作，除了总编辑匡亚明有写作经验外，其余全都是新手，还有一个女大学生也没有编辑经验，另外还设有电教室、营业部，共30多个人。报社当时除《青年报》带的全部家当外，还有一台脚踏圆盘印刷机，一台手摇石印机，标题字只有寥寥几个，一部分老五号铅字和老二号宋体

铅字以及四号标题铅字。

到了第二年，即1940年，他们又弄来两台大的印刷机器就用铅字印刷了。当时条件有限，编辑部就安排在王庄村南村民王德勇家里，王德勇当时是自卫团的连长，有三间小西屋，两间小南屋，刘导生和匡亚明住在北屋里。印刷厂安排在距离王庄村八里开外的云头峪村，地势隐蔽有利于对付日寇的突袭和扫荡，于一川、郭克刚的办公室和住处，都在村民牛庆禄家三间两开间的北屋里，还安着电话机子，装订室就在牛纪全家的两间小东屋里。尽管条件艰苦，但人人都热情高涨，准备就绪，说干就干。匡亚明提议：本报宗旨是立足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就叫《大众日报》，并向郭洪涛征求意见并征得同意。

1939年1月1日创刊号头版、版心处刊登的就是匡亚明起草的发刊词：本报的使命就是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大众日报》就在云头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诞生了。

《大众日报》创刊时所用照相机、油印盘

照相机：藏品号1448—33，照相机呈长方形箱式，前面有铁皮包裹，后面是由纸壳为胎，外附一层皮革包裹，通高10.2厘米、通长13厘米、通宽7.5厘米，重450克。照相机正面上部有两个取景框，直径为1.6厘米，左侧取景框侧面有一个长方形取景窗，长度为2.7厘米，宽度为2厘米，左侧凸出一个手柄柄，往前侧有一个可以控制快门的铁钮；右侧取景窗之上，有一个长方形取景框，长度为2.7厘米，宽度为2厘米，照相机的后侧有三个孔。相机是美国柯达公司生产的普及方箱式相机，设计灵感来自加拿大裔美国铁路承包商



照相机

Palmer-Cox (帕尔默·考科斯)创作的儿童故事《勃朗尼小精灵》，推出的广告语是“Even Kids Can Use It”(“连孩子都会用”)。设计师特意在照相机的外盒画上了勃朗尼小精灵，勃朗尼相机最初是采用二十五分之一秒的简单快门。大约在1930年(农历的庚午年)出产了外壳为棕色和蓝色的，两个规格都叫“勃朗尼”(BEAU)，镜头也有改进为两片结构，《大众日报》创刊时所用的这件就是双镜头，棕色款。这款勃朗尼相机价廉物美，在20世纪30年代风靡全球非常流行。该照相机1998年6月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油印盘：藏品号1416—1，为铁质圆形，正面光滑平整，直径为42.8厘米，通高为10.8厘米，厚度为1.8厘米，重11.425千克。油印盘背面之最外缘凸起一圈，内向有29个齿状形圆圈，油印盘中间为圆轴形的底座，其底座直径为6.6厘米，通高为2.5厘米，中间的圆轴直径为3.3厘米，轴高为6.5厘米，呈上粗下细状。

《大众日报》的刊发，鼓舞着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与敌人英勇斗争。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寇由全面进攻改为对我抗日根据地蚕食扫荡，作为极其重要的舆论宣传抗日的《大众日



油印盘

报》社和报社印刷厂，俨然成了日寇的心腹大患，被列为重点破坏铲除的扫荡目标之一。他们到处寻找《大众日报》的踪迹，有时候报社刚刚落脚驻扎开始工作，突然得到敌人进攻的情报，报社人员必须立即收拾笔墨稿件。最麻烦的是印刷机器，只好能带的就带着，不方便带的就地掩埋起来，有时候遇到敌人突袭，报社的同志措手不及，又舍不得丢掉，只好迅速整理带着机器和行李，钻山穿林和敌人周旋，利用山区隐蔽而又熟悉的地势，牵着敌人捉迷藏打游击。有一次黄中华肩挑五六十斤的油印机器，手拎着简单的行李，沿着崎岖山路从甘泉寺走到云头崮。有时候还得与敌人交火作战，记者火线采访拍摄，编辑部就在战壕里赶稿子，印刷工人们更是得躲着敌人炮火，躲避着开动机器一边印刷一边作战，报社的同志们和当地的民兵群众，武装起来团结抗战，一致对敌，誓死也要保卫报社和印刷厂。

文物见证历史，照相机和油印盘更承载了抗日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报业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大众日报》诞生于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人们了解前线战况的重要途径，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大众日报》仍然担任着重要的宣传作用，是一处权威的舆论阵地。